

特稿

长征中人民战争思想的实践探索

■郭妍

习主席明确指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战争思想穿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90年前,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伟大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在一定程度上说,长征是在极端恶劣、无后方依托的艰难险境下,对人民战争思想进行一次丰富发展的重要实践。

阅读提示

人民战争思想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长征中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实践,以其艰苦卓绝的历程和辉煌伟大的胜利,深刻昭示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实施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行多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等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打赢智能化条件下人民战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和智慧滋养。

一

“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屡经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根本在于毫不动摇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红军遭受严重挫折。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将强化党的领导置于首位,通过一系列举措加强党的领导和支部建设;要求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重要军事决策必经集体讨论;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重大问题须经支委会决定;沙窝会议重申红军必须接受党中央的唯一绝对领导;团以上单位逐步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正是依靠党的绝对领导,红军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在极端困境中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意志,为长征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政治根基。

长征的历史昭示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是军事决策科学、部队组织稳固、战斗意志凝聚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伟力。

二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长征是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情报获取、物资补给、伤员救护等生死攸关的任务,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此时的群众工作,已超越一般政治宣传,成为维系部队生存、支撑作战行动的核心环节。

长征开始后,人民军队“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三大任务逐步恢复。群众工作在这场史诗般的战略转移中,有效巩固了军民鱼水情谊,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通过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通过“打土豪、分浮财”,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通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买卖公平、借物归还”等具体行动,塑造了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形象。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赢得了沿途群众宝贵的物资援助、情报支持和兵员补充,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长征的胜利深刻证明,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的力量主体。将分散的民间人力物力有效整合,就能转化为流动作战条件下克敌制胜的强大战斗力。新时代人民国防动员,必须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将全民国防教育作为战略工程常抓不懈;顺应社会信息化趋势,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提升动员质效;健全完善国防动员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平时准备充分、战时保障有力。

三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长征中,党和红军成功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代表等的统战工作。

长征期间,红军敏锐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矛盾,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例如,长征前夕,利用粤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达成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在内的“五项协议”,为初期突围创造了有

利条件。在苗、瑶、彝、藏、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党推行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绝对尊重民族风俗与宗教信仰;审慎区分地方部族上层与反动豪绅,避免将少数民族富裕阶层简单等同于“土豪”进行打击,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彝海结盟”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通过彝区,为抢渡大渡河争取了宝贵时间。对宗教界,红军保护寺庙经堂,尊重信仰自由。格达活佛在红军北上后,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彰显了统战工作的巨大成效。党通过统一战线,有效争取了中间力量,团结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新时代打好人民战争,仍需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更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与人民战争战略需求紧密融合,为国防动员、科技协同、舆论斗争等提供坚实的支撑。

四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长征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创造性地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实践,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现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长征的中心目标是战略转移,作战行动服从服务于整体大局,贯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不打无把握之仗,有利则集中开敌,不利则迅速转移;行军路线依敌情变化灵活调整,声东击西,以“走”创造战机,以“走”争取主动。“四渡赤水”就是这一战略战术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以高度机动的战术调动打击敌

军。土城战斗遇强敌,果断撤出“一渡赤水”;抓住黔北空虚战机,“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为调动敌军西进,“三渡赤水”佯动;趁敌西调,折返贵州“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挺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遵义战役则集中优势兵力运动开敌,取得长征以来重大胜利。“走”与“打”的完美结合,淋漓尽致展现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灵活性。

现代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战争指导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既要传承弘扬长征运动战蕴含的辩证思维,推动传统战法创造性转化;更要深刻把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规律,运用新技术更新战争认知,统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牢牢掌握军事斗争主动权。

五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千万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人民战争既依靠群众提供支援保障,也需组织群众直接参与斗争,构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作战体系。

长征途中,红军持续面临战斗减员压力,扩红工作与群众动员紧密结合。打土豪、开群众大会既是发动群众,也是动员兵员的契机,沿途约2万青壮年加入红军,有效补充了有生力量。同时,红军高度重视地方武装建设,相继建立川南游击纵队、黔北游击队、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等武装力量。这些武装积极配合主力作战,牵制迷惑敌军,安置收容伤病员,部分经考验后编入主力红军。直罗镇战役中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密切协同,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担负主要作战任务,地方武装迟滞干扰,形成强大合力。主力军与地方武装协同作战,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为人民战争思想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时代人民战争组织动员,必须立足国家整体实力进行体系谋划。坚持平战结合、军民融合,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发挥制度优势,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着眼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系统提升人民战争整体威力。过去,我们依靠人民战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和未来,它依然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战胜一切强大敌人、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力量之源。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人机协同重塑作战指挥链路

■张清华 宋晓冬

谈兵论道

以人工智能、无人作战、云端计算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加速应用,推动现代作战指挥模式迈入人机协同主导的新阶段。人机协同绝非人与机器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指挥链路深层次的结构优化与模式革新。人机协同从根本上重塑指挥链路运行逻辑,推动其从层级串联向全域互联、动态适配、韧性抗毁的分布式并行模式跃迁,构建全要素、全流程、全维度高效协同的运行体系。

指挥员从经验决断向战略决策主导跃升。传统指挥模式下,指挥员全面负责态势研判、决心下定、方案制定及突发处置等全流程决策,受制于个体认知水平、信息处理效率及生理极限,易出现判断局限、决策偏差、掌控乏力等问题,决策效能高度依赖个人经验与素养。人机协同框架下,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决策环节,驱动指挥员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全程介入的决策执行者,跃升为定向、控全局、做终审的战略决策主导者,形成“人脑定策、机器演算、人机协同”的新型决策机制。一是智能系统高效赋能基础环节。依托数据挖掘、深度学习、全域感知等技术,智能系统主要承担海量情报整合、战场态势解析、敌情动向预判等基础性、时效性强的计算分析工作,自动生成

人机协同深刻重塑作战指挥链路职能,其关键在于以智能技术为杠杆,充分激发和倍增人的核心主导作用。必须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立足未来战争需求,不断深化人机协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牢牢掌握指挥主动权,为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指挥保障。

成多套预案并完成仿真推演、风险评估与迭代优化,将指挥员从繁杂的信息处理与方案推演中彻底解放。二是指挥员聚焦核心战略决策。指挥员主要精力集中于作战意图确立、重大风险权衡、跨域矛盾协调、极端场景处置等核心战略任务,负责明确作战目标、把握作战方向、督导行动落实。尤其在智能算法存在局限、战场突发异变、触及政策红线等关键节点,指挥员必须依靠自己的战略判断力、创造力和指挥艺术作出最终决断。三是强化人机协同边界管控。指挥员需动态掌控人机决策边界,严密监督智能系统运行,确保机器运算始终服务于整体作战意图,坚决防止过度依赖技术导致指挥权弱化,牢牢掌握指挥主导权,实现决策速度与质量的最优统一。

参谋机关从业务执行向智能中枢转型。参谋机关作为指挥链路的关键枢纽,传统上以信息流转、文书拟制、协调保障等事务性工作为主,存在层级多、流程长、协同慢等瓶颈,难以高效统合全域作战力量。人机协同赋能下,参谋机关得以摆脱重复性事务束缚,核心职能向智能统筹、体系协同、资源调配、态势管控升级,转型为智能化指挥体系的高效

运转中枢与协同核心,全面打通信息壁垒与协同障碍。一是情报处理智能化提速。智能指挥平台替代人工完成情报汇集、整编分发、指令传输、文书生成等例行工作,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智能交互技术,实现作业产品快速生成、精准推送、实时同步,大幅压缩指挥周期,显著提升信息流转效能。二是决策支撑专业化升级。参谋机关从传统信息“二传手”,跃升为智能系统运维、方案深度审核优化、战时态势专业分析的核心力量。重点对智能系统输出结果进行校验完善,围绕复杂战场问题开展深度筹划,为指挥员提供精准、专业的决策建议。三是行动调控全域化联动。依托全域智能指挥信息网络,参谋机关实时整合陆、海、空、天、电、网等多域作战资源与单元,监控力量状态,根据战场态势动态优化编组、调度资源,实现跨军兵种、跨作战域、跨指挥层级的无缝协调与精准控制。四是体系韧性智能化保障。承担指挥链路韧性保障重任,通过智能监测实时排查系统故障与网络风险。在通信中断、系统受损等极端条件下,能够快速切换备用链路,确保持续稳定指挥,大幅提升指挥体系抗毁与再生能力。

战斗人员从单装操作向终端指控进化。作为指挥链路的末端执行主体,传统作战中战斗人员主要被动执行上级指令,自主空间小、临机反应慢,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一线态势。人机协同模式下,智能单兵系统、无人作战平台、战术感知装备广泛应用,推动战斗人员角色由指令执行者,进化为集自主感知、临机决断、指控协同于一体的独立作战单元,最大限度释放末端作战效能。一是智能装备赋能战场感知。配备的智能终端、无人平台、感知设备成为强大辅助,为战斗人员实时提供精准战场态势、目标信息、装备状态数据,显著提升战场信息获取能力。二是临机自主决策能力增强。战斗人员根据上级指令,可结合智能系统建议与战场实际情况,自主调整行动、规划路径、选定目标,从而实现“感知—决策—行动”的快速闭环响应。三是人机组网协同高效作战。机器承担侦察监视、精确打击、高危保障等任务,战斗人员负责操控维护、信息传递、目标确认及现场处置,构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的作战小组,有效降低伤亡,提升行动精准性与灵活性。四是末端信息实时双向反馈。战斗人员不仅是任务执行者,更是一条态势信息的实时采集者与反馈者,将现场数据精准推送至指挥中枢,形成“前沿感知—中枢决策—末端执行”的高效双向互动回路,确保指挥决策紧贴战场实际。

观点争鸣

●“去专业化”不是“非专业化”,其本质绝非军事专业能力弱化,而是专业能力由一线操作岗位向体系支撑、由个体向系统、由内部封闭挖掘向整体开放聚合的重构,是战争能力生成方式的深刻变革。适应无人智能作战“去专业化”趋势,应树立“大专业”理念,加快构建体系化专业能力,推动各类资源规范融入作战体系,提升无人智能作战体系运行效能和持续创新能力

“去专业化”是社会学中的学术概念,指特定职业的知识壁垒和技能门槛随着技术进步而逐步消解的过程。在军事领域,传统作战能力主要依赖长期专业军事训练和实战经验积累,具有明显的专业门槛。随着无人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无人智能作战由平台中心向体系中心、由人力主导向智能赋能加速演变,人机交互向数字化、可视化发展。依托前台体系,非军事专业人员在后台通过虚拟网络参战成为可能,战斗力生成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无人智能作战呈现“去专业化”趋势。

专业门槛降低,体系支撑凸显

传统作战中,武器装备效能主要依赖专业军人的长期训练和经验积累,作战能力更多体现为个体岗位能力。从装备操作、目标判读到火力运用、战术协同,各环节均需长期专业训练,专业能力成为人装结合、释放效能的前提基础。无人智能作战正在重塑这一能力生成方式。随着自主控制、智能识别、路径规划、辅助决策等技术广泛应用,大量过去依赖专业人员掌握的复杂技能被封装于算法模型、软件系统和智能平台之中,部分专业知识由“人实际掌握”逐步转向“系统承载”。操作人员无需全面掌握装备原理和操作运用,更多承担任务确认、目标处置、态势监控和异常干预等职责。以FPV无人机为代表的新型装备广泛采用第一视角显示、图形化界面、游戏手柄操控等交互方式,其操作逻辑与电子游戏、飞行模拟器高度相似,游戏玩家通过简单培训即可承担“点杀”任务。作战行动逐步由依赖长期专业训练向依托虚拟平台操作转变。岗位门槛的降低,反映的是专业能力承载方式的变化。过去集中于一线岗位的专业能力,加速向算法模型、数据训练、系统集成和指挥控制等后台体系迁移。前台越趋简便,后台越需越高;岗位越趋开放,体系支撑要求越高。“去专业化”降低的是岗位操作门槛,升级的是体系支撑能力,改变的是专业能力的承载方式,而非专业能力本身。智能化使复杂技能越来越多地封装于无人系统之中,“游戏化”使人机交互更快转化为作战能力,推动无人智能作战向“去专业化”发展。

力量边界拓展,聚合能力增强

专业能力的内涵与形式迁移,不仅重塑了无人智能作战能力生成模式,也为参战力量拓展和作战潜力释放创造了条件。传统作战中,参战力量主要依托军队建制体系生成,作战主体相对封闭。人员培养、能力形成和任务实施均依赖长期专业训练,社会力量主要承担装备生产、后勤保障等外围支撑任务,战争潜力更多来源于专业能力量,军事专业能力呈现封闭式生成特征。无人智能作战正改变这一力量生成模式。随着无人平台广泛运用和网络化协同不断发展,侦察观测、目标识别、数据处理、软件开发、设备维护、算法优化等大量任务,与民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能力高度契合。现代作战能力越来越多建立在数字技术、数据资源和网络协同基础之上,科技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具备数字技术背景的社会人员,依托统一平台和标准规范,可以深度参与作战保障与体系运行,作战力量量生成开始由军队内部培养逐步向国家整体能力聚合拓展。参与主体越多,越需要统一任务分配、标准规范、数据共享、安全管理和指挥控制。专业人员承担筹划决策、体系运维和态势控制等核心职责,社会力量依托专业化优势参与体系运行和能力支撑,二者在统一体系下分工协同、优势互补。智能化推动作战能力边界不断向国家整体能力聚合拓展,反映的是作战力量生成方式的深刻调整。

行动自主凸显,体系协同跃迁

作战力量量生成方式重构,不仅拓展了力量边界,也为作战行动组织由层级控制向分布协同演进奠定基础。传统作战主要依托层级化指挥体系运行,任务筹划、命令下达、行动实施和情况反馈一般遵循逐级传导模式,作战行动更多依赖指挥员指挥

控制。随着自主无人系统广泛运用,部分作战单元能够依据预设任务、行动规则和协同机制,自主完成侦察搜索、目标识别、路径规划、跟踪监视等行动。前端作战单元更多围绕任务目标自主响应战场变化,后台体系则承担态势感知、规则设定、算法优化、资源调配和跨域协同等职责,作战行动由依赖层级控制逐步转向依托体系支撑和网络协同运行。作战行动自主程度提升,对协同机制提出更高要求。无人智能作战优势,不在于单个平台的自主能力,而在于不同平台、不同力量、不同领域能够实现实时互联、动态协同和体系联动,使局部优势转化为整体优势,使分散行动聚合为体系效能。作战行动组织正由层级控制向任务牵引演进,由集中控制向网络协同演进,由人工主导向人机协同、智能自主演进。行动的自主协同,反映的是作战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

资源保障开放,体系聚合制胜

作战组织方式的重构,不仅提升了无人智能作战体系运行效能,也进一步推动作战资源生成方式由封闭供给向开放聚合演进。传统作战中,后勤、装备、作战等各类保障主要依托专业体系,装备研发、生产、补给、维修等环节相对封闭。随着数字技术、智能制造、云计算和网络平台快速发展,大量民用技术、商业产品和商业资源经过适配整合后不断进入作战保障体系。商业卫星遥感、开源情报、多源数据、云计算平台、数字孪生、分布式制造以及商业无人装备等资源,逐步成为态势感知、目标识别、装备保障、任务推演和能力生成的重要支撑。游戏引擎、虚拟仿真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拓展作战行动新空间,使作战资源供给逐步由封闭保障向开放聚合转变,资源获取方式更加多元,保障体系更加开放。资源开放共享,更依赖统一规范和安全管理。民用技术进入作战体系,必须完成任务适配、质量验证、安全加固和体系认证;社会信息转化为作战情报,必须经过筛选核验、交叉验证、融合研判和反欺骗处理;商业系统和开源软件投入作战运用,也要纳入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和统一规则。开放资源只有纳入统一体系运行,才能真正转化为持续稳定的作战能力。资源供给的开放,反映的是作战资源生成方式深刻变革。作战资源正由专用保障向开放聚合演进,专业竞争也由装备性能竞争向创新体系竞争拓展。未来战争中,真正决定持续作战能力的,不仅是装备数量和技术水平,更是国家创新体系整合科技、产业、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的能力。谁能够建立高效协同、快速迭代、安全可控的国家创新体系,谁就能够持续将创新优势转化为体系制胜优势,在智能化战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去专业化」：无人智能作战新趋势

■杭兴龙 刘义庆